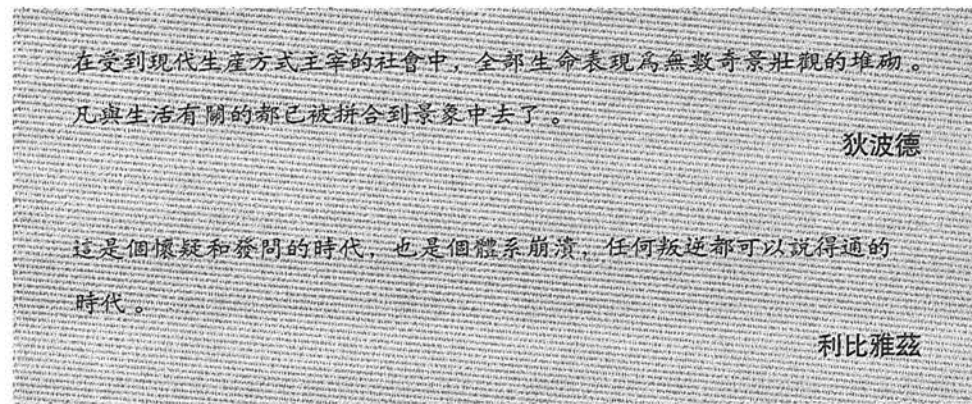


景觀

從空間的政治經濟學看 香港：奇迹與幻象

●黎錦超、卡思伯特 (A. R. Cuthbert)



在受到現代生產方式主宰的社會中，全部生命表現為無數奇景壯觀的堆砌。

凡與生活有關的都被拼合到景象中去了。

狄波德

這是個懷疑和發問的時代，也是個體系崩潰，任何叛逆都可以說得通的

時代。

利比雅茲

香港可算得上世界有數的大城市，然而它卻沒有甚麼我們一向認為可以顯示「偉大」的特色：這兒見不到優雅的廣場、公園、林蔭大道，也無從尋找宏偉的教堂、寺院，或彰顯政權、藝術、智慧、文化的建築、碑表；甚至倫敦、巴黎、紐約、三藩市那些典型的十九世紀漂亮住宅也無蹤影。在香港，通過建築而保留下來的歷史和記憶已被抹得一乾二淨。為甚麼會這樣？它對明日的東南亞都市有甚麼啟示？這就是我所要討論的問題。

建築師往往喜歡想像城市應該怎樣成長，而忽視城市發展的實際情況。我則認為城市的形式正就是它社會秩序的形式，因此建築師所必須面對的真正難題是把抽象、無形和不連續的「社會空間」特性用「都市建築空間」的具體形式表現出來。所以，一個城市的建築可說是包容它社會關係的封套，而這封套的演變則是由我們所謂「空間的政治經濟學」主宰的。說到底，東南亞城市的問題其實是和世界經濟以及全球性的財富生產分不開的——這就是我引用利比

• 本文原為在「伊斯蘭建築與未來的東南亞城市」國際研討會(耶加達1989)上提交的英文論文，嗣經原作者同意，稍經刪節翻譯成中文在本刊發表。

雅茲 (Alain Lipietz) 的「奇迹與幻象」^①作為本文題目的原因之一。

就香港而言，這種建築與經濟間的緊密關係，可以追溯到上一世紀中葉英國為了爭奪世界霸權而割取這塊殖民地的時候。到近年，「新興工業國家」和南韓、台灣、星加坡、香港「四小龍」的出現，使得這種緊密關係變得更加突出。為了從不斷變動的廉價勞工市場吸取最大利益，先進經濟大國推出所謂「國際分工」的策略，使生產過程的「解構」不但在城市和地區，而且也在國際層次上實現。上述地區就正好納入這個體制之中。

從這個觀點出發，哈爾維 (David Harvey) 認為西方城市不單對市民有使用價值，而且應該視為積聚財富的龐大工場——一個「為生產而建造的環境」^②。由是，他提出了都市發展的基本悖論：城市本身的堅固反而成為利用空間不斷產生資本的主要障礙。人工建造的環境是固定的，它不像股票那樣有流動性，所以經濟的迅速增長無可避免地會導致都市本身的不斷循環再造。他說：「為要克服空間的障礙，並以時間來毀壞空間，我們建造空間結構，但後者又轉而成為繼續累積（財富）的障礙……所以，一時間財富建造起適合本身當前需要的城市面貌，跟着往往因為危機來臨，又得去毀滅它，兩者循環鬥爭不已。」

但我要討論的並不是生產問題。我要提出來的是：東南亞城市雖然得像西方國家一樣，把本身經濟力量擴展到全球，但同時也必須在消費和文化體系方面保存本體的認同。這樣，自然得先說明白在城市中文化和認同感遭到些甚麼威脅。利比雅茲在文首引言中說我們的時代是任何叛逆都可以說得通的時代^③。波特拉德 (Jean Baudrillard) 則認為在產製文化的場所，商品的符號價值和

交換價值兩者都威脅到個人、文化和地方的認同感，所以也是上述背信棄義之風最猛烈的地方^④。說得更明白一點，由於附從先進經濟大國行列而獲得的利益是有沉重代價（這些大國本身也正在支付的同樣代價）的，——這就是由經濟增長帶來的商品關係對認同感、文化和環境所造成的威脅。

要進一步說明這觀念，我們不妨看狄波德 (Guy Debord) 在他的《景觀社會》一書開頭所說的：「在受現代生產方式主宰的社會中，全部生命表現為無數奇景壯觀的堆砌。凡與生活有關的都被拼合到景象中去了。」^⑤這雖然好像說得有點過分，但我們只要看看傳播媒介對先進經濟國的衝擊，就可以知道其實他說得多麼中肯。他所提出來的這個「景觀」(spectacle) 概念，其實可以追溯到古羅馬，但對今天以世界博覽會、購物天堂、汽車大賽、奧林匹克運動會、高峰會、國際會議等等洋洋大觀來吸引投資的所謂「後現代城市」自然有更貼切、更深刻的意義。在這些城市裏面，狂熱消費的奇觀擺佈了形象與文化，從而變成控制社會的工具。在香港，這種後現代現象表現為城市發展所造成的文化解構、變質和重組，然後完全地和經濟策略相結合。這就是我們要在下文以「奇迹與幻象」的對立觀點分五個層次來討論的。

一 經濟與社會

奇迹 香港在1960-1985年間年平均總產值增長率高達9%

幻象 這是由「放任自由」原則造成的

近一百五十年前，英國從中國取得

香港島，主要為的是獲得一個可以推行法治的基地，以便他們的商業資本家利用工業革命產品，不受限制地就近進行對華貿易。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從1950年左右開始，在上海資本所造成的紡織工業基礎之上，香港逐漸從重商資本主義蛻變為工業資本主義城市；其後三十年間，香港經濟迅速增長，到1980年它又再一次向以金融資本為基礎的服務業經濟轉化了。

但這經濟奇迹自有它的背景，而且必須和所謂「自由放任」原則的幻象對立看。事實上，自1955年以來，非市場力量一直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這主要見之於政府獨佔了土地使用權，以及它對公共房屋、公共建設和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作出了大量投資^⑥。同時，廣東省事實上成為香港的農業腹地，為香港提供了廉價食品、衣物、用品。這種種都等於是對香港私營投資者的補貼；另一方面他們自然也從大量廉價勞工的供應，資金、商品的自由流動，土地的自由買賣，社會的安定，工會的溫馴，簡易的勞工法例等一般性的社會情況得益。然而，雖然政府作出不少努力，到1987年仍有45%勞工是生活在社會福利署所訂定的貧窮線——四口之家每月收入港幣\$3,500——或以下。

二 空間的政治經濟學

奇迹 半數市民能入住政府公屋
幻象 城市環境因此在改進

在二次大戰結束時，香港是個「殘舊、飽受戰爭破壞，沒有明顯前途的前工業社會」^⑦。戰後的重建，改變了香港市區的面貌和格局，鋼筋混凝土造的高層大廈代替了舊日的樓房。但因此以

為整個市區環境在改進，則只不過是幻象而已。

香港重建時所奉行的原則，就是根據最適合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需要的方法，來將人際關係進行「分區」（zoning）。實用經濟目標所決定的城市設計思想，帶來了大規模的，包括教育、醫療、福利設施在內的公共屋宇計劃。就空間而言，這種發展取消了建築和都市形式的複雜性；就社會而言，它將大眾的貧窮加以制度化。在1960至1980年二十年間，有將近百萬移民從中國進入香港，為工業家帶來了無數廉價勞工，也為政府的房屋、教育和其他服務設施帶來巨大壓力。至今雖然有45%的市民已經入住公共屋邨，但仍有五十萬人住在簡陋的安置區輪候搬遷。為了獲得解決這許多問題的資金，而土地是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就必須以製造土地供應不足、放寬樓宇高度限制以及在高價區填海造地等等方式，把城市的形態徹底加以改變。

三 發展所帶來的問題

奇迹 土地發展帶來天文數字的收益
幻象 社會和環境沒有因此產生大量問題

香港人口在1950年僅200萬，但1972年增至400萬，1989年更上升到580萬。換言之整體人口密度已達5,800人/平方公里，在市區更高達35,000人/平方公里。大部分勞動力集中在人類有史以來密度最高的地方，究竟會有甚麼後果？這一點政府從未曾好好研究過。另一方面，政府擁有用地專利權。由於它實施公開拍賣土地和壓制郊區發展以造成市區缺地的政策，地價不斷上升。因

此，在過去二十年間，政府從土地和物業所得的收益，平均竟佔它總收入的30%，而在1980-81更佔45%之多。

結果是，香港所有的發展都成為「土地密集」型的。政府以最低限度的使用管制和最大限度的行政酌情權來維持良好的地產投資氣候，創造出有限的土地轉讓必定能以天文數字價值成交的奇迹。這一過程本身自然包含了無可避免的內在衝突：既要有「穩定」局面以使地產建設有利可圖，又要有「不穩」局面以鼓勵投機買賣。換言之，為了穩定，要控制發展；為了避免打擊以發展物業而累積資金的過程，卻又不能真正控制。因此有計劃的發展其實只不過是幻象：為了商品生產，一個有人性的環境已被犧牲掉了。

四 香港的市區環境

奇迹 一個世界都會在僅僅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發展起來

幻象 香港的市區環境沒有為此付出巨大代價

前述的發展策略透過官地契約、城市規劃條例、建築物條例和房屋條例等四種主要法令來確立和推動。由此而產生的市區建築可以分為四個主要類型：公共屋宇、商業中心、遊客區和工業區。

● 公共屋宇

自1955年石硤尾木屋區大火使五萬多人無家可歸之後，興建公共屋宇成為經濟上最優先，但投資上則最受壓榨的項目。建築設計完全以實用為目標：它以高度壓縮的組件形式，在每一區的整體、每棟樓宇、每層、每居住單位、乃至單位內部的間隔這各個不同層次實

現，甚至連有關設施也一例看待。為了減輕中心區域的壓力而興建的新市鎮，卻並不採用花園式設計，使得用地的老問題一再以新形式出現。全部供大眾使用的空間因此表現得越來越整齊、簡單，並且和香港其他部分隔離。藉着發展的美名，幾乎所有公共空曠地都一一被佔用了。結果，在社會和文化層面上，都產生了系統性的強烈異化。

● 商業區

香港有三個主要商業區：中環、尖沙咀和銅鑼灣。雖然公共屋宇的建設受到為它專設的法例嚴密控制，然而，為了讓房地產投機不受規則阻礙，興建商用和辦公樓宇卻必須以混亂無序的用地發展方式進行。在地產必須維持高價的區域，發展商實際上可以自由下注賭博，至於香港那行之已有五十年不曾改變的城市規劃法例，對他們來說是有利而無礙的。

在香港，商業和辦公樓宇是共生的，並且往往以一幢高層「寫字樓」座落在三層巨型空調商場之上的形式出現。社會空間的商品化在這種環境裏再明顯不過。由於政府不願為公眾提供露天空地，因此逐漸造成私營企業各自建造公眾廣場，把「文化空間」吸收到商品市場中去的趨勢。這樣，在像置地廣場、新世界中心、海運大廈、八百伴這些地方，甚至人與人之間的偶然私下接觸，也完全被吸納到為交易而建造的空間裏去。在這類特殊的空間之中，個人行動的自主性在狂熱、蔚為奇觀的消費觀念的主宰下已犧牲掉了。

● 旅遊區

狄波德說：「旅遊，即把人的流通看作消費（其實是商品流通的副產品），只不過是去觀賞已經變為平庸的事物……把時間從旅程去掉的現代化交通，同

樣也會把空間的真實性從旅程去掉。」^⑧旅遊這種「無烟工業」對香港的城市形式也帶來了極大衝擊。遊客抵港後立刻接觸的環境正好證實這個講法——老實說，他們若留在原來的城市，那麼去參觀一個展覽館所見到的，肯定會更有特性，更有意思。九龍半島的尖沙咀東區是個「城中之城」，它為遊客提供了夠庸俗的去處；在附近，其他遊客留連的商場如海洋中心等，同樣乏善足陳，而這些正是本地人必須日日忍受的。

● 工業區

高地價政策對工業發展形態影響重大，高層工業大廈這獨特的現象，就是由它造成的。這些高層大廈遍佈港九各地——事實上，填海所得的土地有一半是用於工業發展——，並往往佔據了新市鎮（如香港仔和觀塘）的中心區域。由於它們選址不當，規劃失調，所以不但從審美角度看損毀了市容，破壞整體城市設計，而且更在市內產生嚴重污染問題，並將市區僅餘的一些山林也都消耗殆盡。這都是由於規劃法例和環境保護管制不足，以及沒有勇氣對工業家說：「夠了！夠了！」而造成的。

五 建築的符號意義

奇迹 我們有創造一個獨特文化環境的機會

幻象 香港仍有建築特色和認同感

由於城市規劃法例准許高密度發展，而且有關決定受到各種資本的雄厚力量影響，所以市區中心建築都只注重門面，而不管兩側、屋後或天面，簡直可說只有內涵而沒有各自的面目。不幸，在香港，人的歸屬感和記憶是沒有

經濟價值的，所以在市區環境中它們已被抹掉。這自然也就加速了建築物平庸相類的趨勢。所以，我們毋須為保存歷史性古舊建築物而尋求經濟援助，因為這些建築物實際上早已有系統地被清除了。只有極少數的例外，例如高等法院、聖約翰大教堂、香港大學的陸佑堂等等，因為作為政權的象徵，或者因為並不妨礙地產投機，而得以保存下來。

事實上，如肯伯特(A.R.Cuthbert)所說，「這城市的氣氛乃是由於廣州人日常生活中多姿多采的事物和各種文化現象充實了現實世界而生成，並非按照高明、有系統的建設計劃營造出來的。」^⑨因此，把廣州文化的符號和象徵從建築物上除去之後，香港的市容和市區佈局就再也說不上有甚麼獨特風格。可悲的是，廣州文化和本地建築風格的表徵能力已經被經濟力量所產生的符號所制宰了。

結果是，主宰性權力的象徵已全面地在工業、旅遊、住宅乃至商業等各種建築形式表現出來。說得更具體一點，像滙豐銀行、中國銀行、奔達中心、合和中心、交易廣場這些財貿集團大廈的形象，已統領了整個香港市區的風貌和設計。這些令人目眩的建築奇觀是財團所需要，也是行內專家所欣賞的，但對市民百姓來說，它們則造成兩方面的貧乏：第一，不可企及的無窮財富和權力所表現出的鮮明形象，令個人的異化感加深而自主感降低；第二，它們把交通、行人、噪音和污染滙集到那過分擠塞，甚至已超乎常人忍受限度的「公眾」空間去，由是增加了個人的具體困擾。無怪香港號稱為繼貝魯特和貝爾法斯特之後世界第三個壓力最大的城市——也是三者中唯一不在戰區之內（真是不在嗎？）的城市了。

六 結論

在歷史上，香港的發展可以分作由資本形式所決定的三個階段。在重商主義階段，資本已經形成，但它還沒有必然的社會關係，同時種族界線超越於社會階級之上。在工業階段，資本的形式和它的社會關係都已充分發展，這時社會階級超越了種族界線。至於最後，即目前的「金融」或後工業階段，則是由壟斷性財團資本所宰制的，這時無論種族界限或階級關係都已經被「生活徹底商品化」這個原則所泯滅了。

黎錦超 1934年生於馬來西亞，現為香港大學建築學院講座教授兼院長，來港前他曾先後任教於倫敦建築學會學院和擔任加拿大門尼多巴（Manitoba）大學建築學系系主任。黎教授在專業方面有卓越成就，曾獲加拿大皇家建築學會院士（FRAIC）銜，並且在香港科技大學校園設計競賽獲獎，又曾多次訪問北京、西安、廣州等城市，對促進中國的建築專業和建築學教育作出貢獻。

（羅奇譯）

註釋

- ① Alain Lipietz: *Miracles and Mirages* (transl. David Maceg, VERSO, 1986).
- ②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Arnold 1973).
- ③ 同①。
- ④ Jean Baudrillard: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Mo.: Telos Press 1981).
- ⑤ 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troit: Black & Red 1983), §1.
- ⑥ I.R.Shiffer: *Anatomy of a Laissez-faire Government—centre of Urban Studies and Urban Planning* (Univ. of Hong Kong, 1983).
- ⑦ A.J. Youngson: *Hong Kong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cy* (Oxford, 1982).
- ⑧ 見註⑤ §168.
- ⑨ A. R. Cuthbert: *Bureaucratic Ideology, Socialism and Space: 1997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fessions in Hong Kong,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Vol 5, No.1, 1989.